

# 《钦定同文韵统》蒙古文、 满文阿礼嘎礼比较研究

正 月

**内容提要** 《钦定同文韵统》是一部多文种合璧阿礼嘎礼字书，有梵、藏、满、汉四体合璧与梵、藏、满、蒙、汉五体合璧版之区别。本文首先阐释“阿礼嘎礼”的概念和范畴，认为“阿礼嘎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在此基础上以五体合璧版《钦定同文韵统》为研究对象，阐释了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字型的来源和结构特征，并对其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 《钦定同文韵统》 阿礼嘎礼 蒙古文 满文

## 一 “阿礼嘎礼”与《钦定同文韵统》编纂刊行

阿礼嘎礼，源自梵语，ali为元音，kali为辅音，《钦定同文韵统》(以下简称《同文》)<sup>〔1〕</sup>第二卷中解释：“其字母五十字内阿阿阿等十六字梵言为阿礼，华言为音韵字；嘎喀等三十四字梵言为嘎礼，华言为翻切字。”<sup>〔2〕</sup>佛教经典汉文翻译中对于梵文佛教专有名词及咒语采取了汉字对音和翻切(或反切)方法，其中音韵字为梵文之阿礼，翻切字为梵文之嘎礼。汉文阿礼嘎礼是我国佛教经典翻译中最早出现的阿礼嘎礼，其雏形见于5世纪法显译《大般尼洹经》卷五《文字品》<sup>〔3〕</sup>。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典籍汉文翻译中佛教专有名词等多采用义译方式，随着佛教教规(包括传颂不能有误)和汉文佛教经典翻译的逐渐成熟，并经过唐玄奘等著名高僧的实践运用，唐宋时期形成了“五不翻”理论<sup>〔4〕</sup>，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对佛教专有名词

\* 本文是故宫博物院2021年开放课题“故宫博物院藏蒙古文阿礼嘎礼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111038)的阶段成果，获得了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支持。

〔1〕 本文所用的《钦定同文韵统》版本是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于1939年所收藏本的PDF版，收藏编号为mo/1803/6787。经作者比对，该PDF版与下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合刊的《同文》一致。

〔2〕 (清)允禄等监纂、章嘉胡土克图纂修(乾隆十四年)《钦定同文韵统》第二卷，上海涵芬楼影印乾隆内府刻本，第2页。本文引用的古文原文无标点符号时作者均有酌情添加。

〔3〕 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满语研究》2014年第1期，第5页。

〔4〕 (宋)周敦义《翻译名义序》，绍兴二十七年(1157)刻本。

词、术语及咒语等采取义译而应采取对音方式。《同文》之“御制序”中也强调说“咒语不翻取存印度本音”。藏文阿礼嘎礼则是初创藏文字母时便已产生，并在大量的佛典藏语翻译中得到使用和完善。众所周知，藏文传统文法文献中包含藏文阿礼嘎礼的读写规则<sup>①</sup>。这说明藏文字母与藏文阿礼嘎礼的创制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藏文阿礼嘎礼已经成为比较成熟、完善的转写系统。如同《同文》卷二“西番字母说”中所言：“今西土（作者按：指今吐蕃），僧众诵持梵语仍用天竺原规，故天竺字母已足译咒之用，至于经文则皆西番之字，其中佛号、地名来自译经者，悉用对音，故其字之音呼必照西番之例。”藏文佛教经典翻译中对于经文一般性内容和佛号、地名、咒语采取的方法是有区别的，前者用“义译”，后者则用“天竺原规”和“对音”。这里所指的“天竺原规”和“对音”便是藏文阿礼嘎礼。

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也是专指佛教典籍翻译中用于转写梵文字母和藏文字母的符号体系及其书写规则。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与汉文、藏文阿礼嘎礼一样，都是佛教典籍翻译“五不翻”理论的产物。不同的是，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多了一套转写藏文的符号体系，这一点在以往的专题研究中未曾明确提到过<sup>②</sup>。这是因为绝大部分蒙古文、满文佛教典籍来自于藏文佛典的翻译，而直接源自梵文佛典的翻译少之又少，有的也只是些咒语的转写而已。

学术界普遍认为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如同藏文阿礼嘎礼一样，是对梵文佛教专有名词、术语及咒语书面形式的转写(transliteration)符号，而实际上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还包含了转写藏文佛教专有名词、术语及咒语的符号体系和转写规则。因此，狭义的“阿礼嘎礼”，是专指梵语的元音和辅音，而广义的“阿礼嘎礼”则包括汉文佛教典籍中使用的“音韵翻切(或反切)字”及其规则，藏文阿礼嘎礼(梵文转写符号)及其规则，蒙古文、满文、托忒蒙古文阿礼嘎礼(梵、藏文转写符号)及其规则等。汉文阿礼嘎礼一般被称为“音韵翻切(或反切)字”，如《同文》中称其为“天竺音韵翻切字”。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虽为转写系统，但在实际文献中经常看到一些拼写读音的形式掺杂于其中，这为复原其藏文、梵文书写形式带来了一些困扰。

《同文》是一部梵、藏、满、蒙、汉合璧阿礼嘎礼字书，21世纪初之前相关研究成果不多，依稀见到几篇文章和一部专著<sup>③</sup>。后来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以及《同文》相关语言文字学研究逐渐增多，有了进一

① 那唐译师《梵文读法》(藏文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罗文华《〈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第35页；王敌非《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第5页。

③ 例如，胡进杉《第三辈章嘉呼图克图及其创制的满文经咒新字》，《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罗文华《乾隆时期满文阿里嘎礼字研究——从〈同文韵统〉、〈大藏全咒〉到〈大藏经〉》，《燕京学报》2004年新十七期；乌·满达夫《阿尤什固始与阿礼嘎礼》，《蒙古语言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正月《阿礼嘎礼研究》(蒙古文版)，乌兰巴托ADMON出版社，2005年。

步深入<sup>①</sup>。王敌非在其《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一文中主要从梵—满语音对音角度对满文阿礼嘎礼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满文阿礼嘎礼拼写梵语长元音、浊塞辅音和送气音的特点,他又于《满译〈般若波罗蜜多咒〉中的阿礼嘎礼》文中阐释了满文阿礼嘎礼在实际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聂鸿音在其《同文》系列三篇论文中分别讨论了汉语官话,梵、藏读音规范和官话尖团音,充分利用了梵、藏、汉语的对音语料。施向东借助梵与藏、汉,满与藏之间的对音关系阐述了当时藏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大致关系。《同文》的语言、文字学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所涵盖的某一个具体民族的语言文字,更主要是体现在其四五种文字的相互对应,它对于了解清代多语言文字背景下的同文之治及其现代价值的挖掘具有很深的学术意义。

除《同文》外,流传于世的阿礼嘎礼规范性文献还有几种,其中三、四、五体合璧的《御制阿礼嘎礼》和《御制读咒法》等均属于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奉敕编撰而成,是专门针对“大藏经”满、汉、蒙古文翻译的对音对字类多体合璧书,还附有编撰者的阐释说明。

《同文》从乾隆十二年在“经咒馆”开始编纂到三十九年刊行五体合璧版经历了27年<sup>②</sup>,分为梵、藏、满、汉四体合璧版和梵、藏、满、蒙、汉五体合璧版<sup>③</sup>两种。四体合璧版《同文》有乾隆十七年和乾隆三十二年(梵、藏、满、汉合璧)的两种,而五体合璧版《同文》(梵、藏、满、蒙、汉合璧)是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刻的乾隆三十九年版本。以往除蒙古文阿礼嘎礼以外的《同文》相关研究,如聂鸿音等学者的论文均以四体合璧版《同文》(即没有蒙古文阿礼嘎礼)作为底本进行研究,笔者以往相关成果和本文所指的《同文》则是包括梵文、蒙古文的五体合璧版。

根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收录情况,五体《同文》流传情况如下:单行本,收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乾隆二十四年版(实际为二十四年刊刻,三十二年印刷),线装,共6册,24.5厘米×13厘米;合刊本1,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收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乾隆三十九年刊行,经折装,25.9厘米×13.1厘米;合刊本2,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版,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线装,23厘米×13.5厘米。

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本是乾隆三十二年版,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所藏本是上海涵芬楼影印乾隆内府刻本字样的合刊本,共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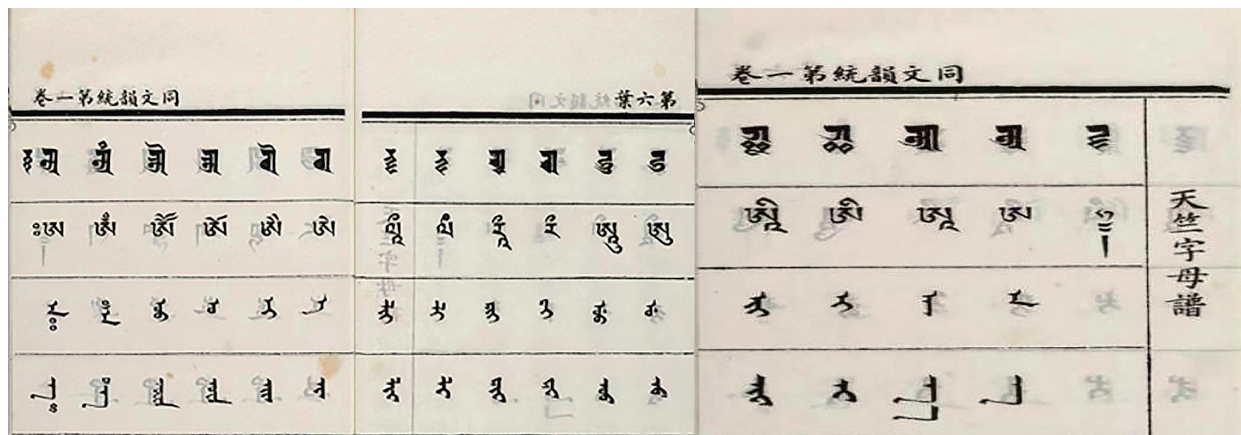
春花在其前揭《论三体及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的编纂和刊行》一文中对《同文》四体合璧与五体合璧版的流向和数量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乾隆皇帝曾三次向京城及直省各寺庙颁赐《大藏全咒》,《同文》也

① 王敌非《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王敌非《满译〈般若波罗蜜多咒〉中的阿礼嘎礼》,《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6期;前揭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清代藏文音读规范》,《语言研究》2015年第1期;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官话尖团音》,《语文研究》2016年第1期;施向东《〈同文韵统〉所见清初藏语概貌》,《民族语文》2018年第1期。

② 春花《论三体及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的编纂和刊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5期。

③ 这里所指的四体与五体合璧包括《同文》卷一中“天竺字母谱”附有的梵文。

〔图一〕《同文》天竺字母谱之元音字型  
采自前揭《钦定同文韵统》第一卷，第6页



随之流布，其中四体合璧《同文》共40部，五体合璧《同文》共55部。由此可见五体合璧版的收藏不仅限于《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所记载的8处，其他40多部及四体合璧版的其余多部的流向需要进一步考察。

## 二 《同文》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来源与结构特征<sup>〔1〕</sup>

蒙古文阿礼嘎礼的产生早于满文阿礼嘎礼一百八十余年，由喀喇沁喇嘛阿尤什固始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编写而成。蒙古文阿礼嘎礼拼写方式萌芽于13—14世纪期间的回鹘式蒙古文佛教文献中，而其梵、藏文转写符号的补充和转写规则的完善由阿尤什固始完成。阿尤什固始编纂蒙古文阿礼嘎礼实际上是为编修和整理蒙古文《甘珠尔》经（1602—1607）而做的准备，他与锡埒图固始一同奉敕阿拉坦汗旨意主持编修。目前还未曾发现阿拉坦汗方面刊刻或阿尤什固始署名的官方“蒙古文阿礼嘎礼”的版本。流传至今的使用蒙古文阿礼嘎礼的佛经中，阿尤什固始所译“qara kelen aman neretü sudur”（消除口孽经）<sup>〔2〕</sup>应为最早的一文。收藏于各个机构的蒙古文阿礼嘎礼读写法之类的书籍均为较晚期版本，如贡布扎布所著木刻板《元音与辅音》、佚名著布里亚特木刻板《梵文十六元音与三十四辅音》，前者为17—18世纪之间的，而后者为20世纪初的出版物。贡布扎布所著“元音与辅音”的蒙古文阿礼嘎礼与《同文》有差异，正月曾撰文作了详细阐述<sup>〔3〕</sup>。

根据目前相关收藏信息和研究成果来看，满文阿礼嘎礼初见于四体合璧《钦定同文韵统》〔图一〕（乾隆十七年，1752），后于乾隆三十二年以《御制阿礼嘎礼》名与《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

〔1〕 本文按照“文字”与“转写符号”概念的本质区别，有意将“字形”与“字型”区别使用，前者多用于字母形式，后者多用于阿礼嘎礼形式。

〔2〕 前揭《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第36页，00180条。

〔3〕 正月《关于贡布扎布的木刻板〈元音与辅音〉》，《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8年第6期。



于乾隆三十九年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合刊形式再次刊行。而康熙帝敕修的三体(梵文、藏文、蒙古文)合璧《御制阿礼嘎礼》应该是目前所见清代官方编修的最早的阿礼嘎礼版本,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乾隆时期刊刻的五体合璧《同文》中呈现的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是一套字体比较完整、规范程度较高的转写系统[图一]。从五体合璧《同文》的满文阿礼嘎礼可以看出其创制和编纂曾受到蒙古文及蒙古文阿礼嘎礼的影响。蒙古文和满文阿礼嘎礼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字型结构和特征上,还体现在二者均有转写梵文、藏文佛教专有名词和术语的两套系统上。

[表一] 梵文、藏文与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对照表<sup>①</sup>

梵文罗马转写	a	ā	i	ī	u	ū	ṛ	ṛī	ḷ	ḷī	e	ē	o	ō	aṃ	aḥ
藏文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ྌ	ཨྌ་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蒙古文阿礼嘎礼	ᠠ	ᠠᠡ	ᠠᠢ	ᠠᠣ	ᠠᠤ	ᠠᠥ	ᠠᠦ	ᠠᠦᠢ	ᠠᠦᠣ	ᠠᠦᠥ	ᠠᠦᠨ	ᠠᠦᠬ	ᠠᠦᠭ	ᠠᠦᠭᠡ	ᠠᠦᠭᠢ	ᠠᠦᠭᠣ
满文阿礼嘎礼	ᠠ	ᠠᠡ	ᠠᠢ	ᠠᠣ	ᠠᠤ	ᠠᠥ	ᠠᠦ	ᠠᠦᠢ	ᠠᠦᠣ	ᠠᠦᠥ	ᠠᠦᠨ	ᠠᠦᠬ	ᠠᠦᠭ	ᠠᠦᠭᠡ	ᠠᠦᠭᠢ	ᠠᠦᠭᠣ

从[表一]中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看,其基础字型均源自蒙古文<sup>②</sup>,可从蒙古文找到其原型。其中a与ā的字尾与蒙古文a的常见词末形式ᠠᠨ不同,采用了与蒙古文ᠠᠨᠡ相同的形式,如[图一]第四行右一、二字这样可以明确区分蒙古语词与梵、藏来源词,满文阿礼嘎礼则不同,见下述。除e、ē、o、ō、aṃ、aḥ外的其余10个元音均按照蒙古文原有的书写规则书写,如长元音的标记法采用了蒙古文的叠书相应元音字母的方式。

e ē o ō aṃ aḥ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在结构上表明了梵语元音的性质。从ē、ō的标音看,二者均为长元音,但是梵—藏传统文法则认为e、o原本为双元音ai、au,而ē、ō为长双元音āi、āu<sup>③</sup>。蒙古文阿礼嘎礼ᠠᠨ ᠠᠨᠡ/ᠠᠨᠢ/ᠠᠨᠣ(e ē o ō)中ᠠᠨ是蒙古文辅音字母w,这里却用来标记元音e。e为ᠠᠨ, ē则为ᠠᠨᠡ的叠书形式ᠠᠨᠡ。o的形式ᠠᠨᠣ如同蒙古文的ᠠᠨᠣᠨᠠᠨᠠᠨ/ᠠᠨᠣᠨᠠᠨᠠᠨ huwa/ᠠᠨᠣᠨᠠᠨᠠᠨ yuwa一样,这里的ᠠᠨᠣ是两个元音中的介音,这是蒙古文书写复合元音的一种正字规则与方法。为此蒙古文阿礼嘎礼ᠠᠨᠣᠨᠠᠨᠠᠨ/o的书写结构o+w+a实际上说明了它是双元音,而ᠠᠨᠡᠨᠡ形式说明其为长元音形式(w的叠书),这两个文字形式表达了它们具有双元音和长元音的双重特点。

藏文传统文法中认为aṃ aḥ是梵语a同附加符号ṃ鼻音化符号anusvāra<sup>④</sup>与ḥ(气音符号 Visarga<sup>⑤</sup>)相结合产生的特殊元音,受此影响《同文》中也收录了16个元音及其对应的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16个元音符号,其中末端两个便是aḥ与上述两个附加符号相结合的形式ᠠᠨᠨᠡᠨᠡ和ᠠᠨᠨᠡᠨᠡ,如[图一]第四行左一、二字。

满文阿礼嘎礼的a、i、e、o、u元音符号沿用了原满文字母的相应形式。满文阿礼嘎礼的ā、ī、ō等长元音

① 本文中的蒙古文阿礼嘎礼与满文阿礼嘎礼字符,采用word界面“插入”符号中MongolianBaiti条目中的字符,这个字符与实际文献中的蒙古文阿礼嘎礼与满文阿礼嘎礼形式有一定的差异,具体请参看《同文》相应图片中的阿礼嘎礼对应形式。藏文字母是Microsoft Himalaya字符,本文一律采用拉丁音标代替梵文字母。

② 本文所指蒙古文或原蒙古文为回鹘式蒙古文,其字母字形与现代蒙古文有诸多区别,是蒙古文早期形式。蒙古文阿礼嘎礼的创制使用促进了回鹘式蒙古文的历史进程,成为蒙古文进入近代成熟期的标志。

③ [日]辻直四郎《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第6页。

符号是其短元音符号的叠书形式，但是a的独写形式为𐎡+特殊词尾，该特殊词尾形式来自蒙古文与满文a、e字母词末形式的木刻体𐎡，类似于蒙古文阿礼嘎礼a的词末形式，𐎡又是藏文勾型a的满文阿礼嘎礼形式，叠书后表示长元音。ē、ū的满文阿礼嘎礼形式为新创形式，为原满文e与i的叠加形式𐎡𐎢，从字型结构上体现了该梵语语音的双元音性质。ū为原满文u与原满文o词末形式的叠加即𐎡𐎣形式，切合满文长元音标记法。值得注意的是ē与i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形是有区别的，ē𐎡𐎢(e+i)字型中间的连接线比i的腰线(连接线)要长一截，如[图一]第三行左第五字(ē)和第三行右三字(i)。𐎡、𐎢、𐎣、𐎤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型与蒙古文阿礼嘎礼形式一致。满文阿礼嘎礼am、ah的形成方式与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相同，是梵文元音附加符号o ∞加书于满文𐎡a的上下而成。

综上所述，蒙古文阿礼嘎礼元音基本字型主要来源于蒙古文字母，其中原来的辅音字母“c”被赋予标写梵、藏语来源词元音e的新任务。而am ah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采用了梵文符号+蒙古文字母形、蒙古文字母字形+梵文符号的混合形式。

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基本字型主要来源于满文字母，除了a的词末形式和e字形，其余长元音标记法均与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一致，ē的字型与其梵语相应元音的双元音性质相关，am、ah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型采用梵文符号+满文字母字形、满文字母字形+梵文符号的混合形式，与蒙古文一致。

以上内容是根据《同文》卷一“天竺字母谱”音韵十六字的字型与结构特征并结合梵—藏元音和蒙古文、满文元音字母及其读音作出的分析和阐释。从《同文》卷二“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十二谱”所罗列的天竺复合字(译咒之用)中，既可以得知天竺音韵16字与辅音字34字结合的复合字种类，又可知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与辅音符号在实际复合字中的出现形式。这十二谱实际上可分为六种，即第一谱的元音16字与辅音34字相结合的复合字、第二谱的辅音33字(𐎡不用)下加半元音y、r、l、v四字结合的复合字、第三至第六谱二个辅音字形叠书的复合字、第七至第九谱与附加符号o ∞(𐎡𐎢)𐎣(ε)𐎤等结合的复合字、第十谱双字及多字叠书的26个复合字、第十一谱和第十二谱的音韵5字(a、i、u、e、o)与辅音34字配合再与哈兰达符号所结合的复合字等。其中与音韵字相关的有第一谱、第十谱和第十二谱。这四个谱中出现的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符号有以下几个特点：1)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𐎡、𐎢、𐎣、𐎤与辅音符号相结合时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𐎡𐎢、𐎡𐎢、𐎡𐎢、𐎡𐎢(蒙古文阿礼嘎礼)𐎡𐎢、𐎡𐎢、𐎡𐎢、𐎡𐎢(满文阿礼嘎礼)，关于这种写法在《读咒法》《元音与辅音》等其他文献中均有解释<sup>〔1〕</sup>；2)第十谱kō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形式为𐎡𐎢(kuu)，正确应为𐎡𐎢形式，这里显然与满文阿礼嘎礼混淆；复合字bhrum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形式为𐎡𐎢𐎣，正确应为

〔1〕 按常规理解，从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𐎡𐎢、𐎡𐎢、𐎡𐎢、𐎡𐎢与𐎡𐎢、𐎡𐎢、𐎡𐎢、𐎡𐎢形式看不出其中的𐎡𐎢 i 标记的是梵文元音r 𐎡𐎢还是辅音r l。但是按照蒙古文阿礼嘎礼的书写规则“ka与ra、la分别叠书再与元音𐎡 i 𐎡相结合时应写为𐎡𐎢、𐎡𐎢、𐎡𐎢、𐎡𐎢，而与元音r 𐎡𐎢结合时应写为𐎡𐎢、𐎡𐎢、𐎡𐎢、𐎡𐎢”来看，可以确定前一种形式中的r、l为辅音，后一种为元音。关于蒙古文阿礼嘎礼此番书写规则，请参看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所藏，上海涵芬楼影印乾隆内府刻本《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合刊本中的御制满、蒙、藏合璧《读咒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有此版，前揭春花《论三体及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的编纂和刊行》)。显然《同文》的蒙古文阿礼嘎礼这一形式与原规则不符，而满文阿礼嘎礼形式符合原规则。

འཁྱུག་པ་形式，这里多了一个词尾形式；3)第十一、十二谱出现蒙古文阿礼嘎礼u、o的字型与卷一不一致的情况，如ung 写作 འཁྱུག་，ong写作 འཁྱུག་，它们的正确形式应该为 འཁྱུག་和 འཁྱུག་。《同文》满文阿礼嘎礼元音字型则始终保持一致。

三 《同文》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来源与结构特征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蒙古文与满文阿礼嘎礼分别有两个系统即梵文系统和藏文系统，我们将分开说明这两种系统的阿礼嘎礼辅音字型之来源与结构特点。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辅音符号比起元音符号数量多，字型结构复杂，我们首先用表格说明梵文辅音字母的蒙古文与满文阿礼嘎礼对应情况[表二：1-4]，再作进一步阐释。

[表二] 梵文、藏文与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对照表

[表二:1] 喉音组与舌尖音组<sup>〔1〕</sup>

梵文罗马转写	ka	kha	ga	gha	nga	tsa	tsha	dza	dzha	ña
藏文	ཀ	ཁ	ག	ཁྱ	ང	ཅ	ཅཿ	ཇ	ཇཿ	ཉ
蒙古文阿礼嘎礼	᠎ᠠ	᠎ᠠᠬᠠ	᠎ᠠᠭᠠ	᠎ᠠᠭᠠᠬᠠ	᠎ᠠᠩᠭᠠ	᠎ᠠᠰᠠ	᠎ᠠᠰᠠᠬᠠ	᠎ᠠᠳᠠ	᠎ᠠᠳᠠᠬᠠ	᠎ᠠᠨᠠ
满文阿礼嘎礼	᠎ᠠ	᠎ᠠᠬᠠ	᠎ᠠᠭᠠ	᠎ᠠᠭᠠᠬᠠ	᠎ᠠᠩᠭᠠ	᠎ᠠᠰᠠ	᠎ᠠᠰᠠᠬᠠ	᠎ᠠᠳᠠ	᠎ᠠᠳᠠᠬᠠ	᠎ᠠᠨᠠ

[表二:2] 反舌音组与齿音组

梵文罗马转写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ta	tha	da	dha	na
藏文	ṭṭ	ṭṭḥ	ḍḍ	ḍḍḥ	ṇṇ	ཏ	ཏཿ	ཌ	ཌཿ	ཎ
蒙古文阿礼嘎礼	ᠲᠠ	ᠲᠠᠬᠠ	ᠳᠠ	ᠳᠠᠬᠠ	ᠨᠠ	ᠲᠠ	ᠲᠠᠬᠠ	ᠳᠠ	ᠳᠠᠬᠠ	ᠨᠠ
满文阿礼嘎礼	ᠲᠠ	ᠲᠠᠬᠠ	ᠳᠠ	ᠳᠠᠬᠠ	ᠨᠠ	ᠲᠠ	ᠲᠠᠬᠠ	ᠳᠠ	ᠳᠠᠬᠠ	ᠨᠠ

[表二:3] 唇音组与半母音组

梵文罗马转写	pa	pha	ba	bha	ma	ya	ra	la	va
藏文	པ	པཿ	བ	བཿ	མ	ཡ	ར	ལ	ཤ
蒙古文阿礼嘎礼	ᠮᠠ	ᠮᠠᠬᠠ	ᠪᠠ	ᠪᠠᠬᠠ	ᠮᠠ	ᠶᠠ	ᠷᠠ	ᠯᠠ	ᠸᠠ
满文阿礼嘎礼	ᠮᠠ	ᠮᠠᠬᠠ	ᠪᠠ	ᠪᠠᠬᠠ	ᠮᠠ	ᠶᠠ	ᠷᠠ	ᠯᠠ	ᠸᠠ

[表二:4] 擦音、气音组<sup>〔2〕</sup>

梵文罗马转写	śa	ṣa	sa	ha	kṣa
藏文	ཤ	ཤཿ	ས	ཧ	ཤྱ
蒙古文阿礼嘎礼	ᠰᠠ	ᠰᠠᠬᠠ	ᠰᠠ	ᠬᠠ	ᠰᠠᠬᠠᠰᠠ
满文阿礼嘎礼	ᠰᠠ	ᠰᠠᠬᠠ	ᠰᠠ	ᠬᠠ	ᠰᠠᠬᠠᠰᠠ

〔1〕 笔者依据学界常用的藏文字母转写法用舌尖罗马字转写了这组辅音，这与《同文》中的汉字对音(精组一等字匣、擦、杂)也是吻合的。

〔2〕 本文各表格中采用的word版蒙古文阿礼嘎礼与满文阿礼嘎礼符号不全，部分字型为拼接形式，具体形式请参照[图一]、[图二]的对应字型。

Figure 1-1 shows examples of regular script characters for the 14 basic strokes, organized into two columns. The left column is titled '卷一 第 統韻文同' and the right column is titled '圖文 隸 葉 七 第'. Each column contains three rows of characters, with each character accompanied by a small number indicating the stroke order.

卷一第統韻文同

ㄅ	ㄆ	ㄇ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ㄏ

[illegible]

2024年第7期·总第267期



蒙古文原字母字形上改变其笔画结构所得出的新创字型：喉音组kha、唇音组pa、擦音组ša共3个符号属于这一类。喉音组清送气音kha无相对应的蒙古语辅音，因此把蒙古文字母ᠬ的字头交叉斜线笔画变成直线笔画作为该辅音阿礼嘎礼形式ᠬ，见〔图二：1〕第四行右第二字。唇音组的pa字型来自蒙古文b字形，将b字头笔画由封闭式ᠪ改变为开口式ᠫ而来，见〔图二：2〕第四行右第三字。ša<sup>4</sup>或ᠰ形式来自蒙古文ša<sup>4</sup>字形双点位置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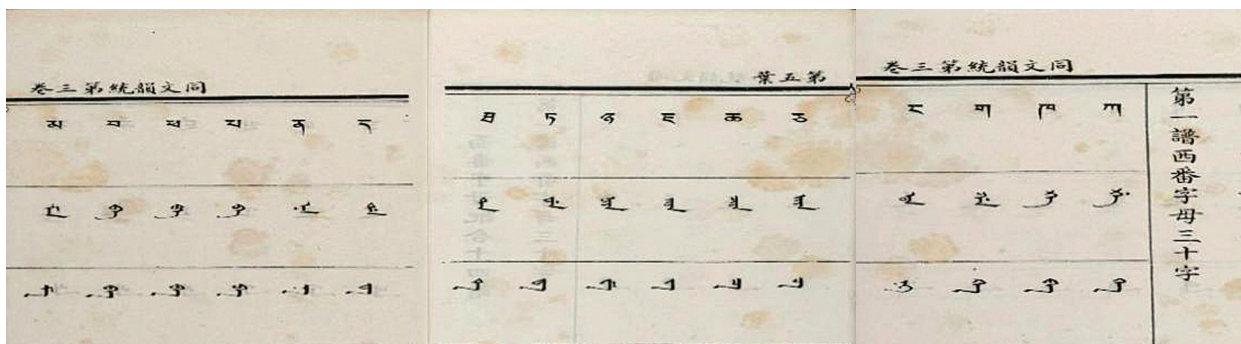
复合方式创制的新字型：梵语gha、dzha、ḍha、dha、bha、kṣa等是浊送气辅音和复辅音，蒙古语没有这些语音，自然也没有相对应的字母，因此这些辅音的阿礼嘎礼字型由相应浊辅音字母+送气音符号组成，即ᠭ᠎ᠠ、ᠳᠵᠠ、ᠳᠥᠬᠠ、ᠳᠠ、ᠪᠠ、ᠬᠰᠠ。

沿用原满文字形的满文阿礼嘎礼辅音字型有：喉音组ga，齿音组tha、da、na唇音组pha、ba、ma，半元音组ya、ra、la、va，擦音、气音组śa、sa、ha，共计14个字型的来源属于这一类。这些辅音与梵语辅音基本相同或相近，其字型来自原满文字母字形，王敌非曾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满—梵辅音间的异同（前揭王敌非《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再此不做赘述。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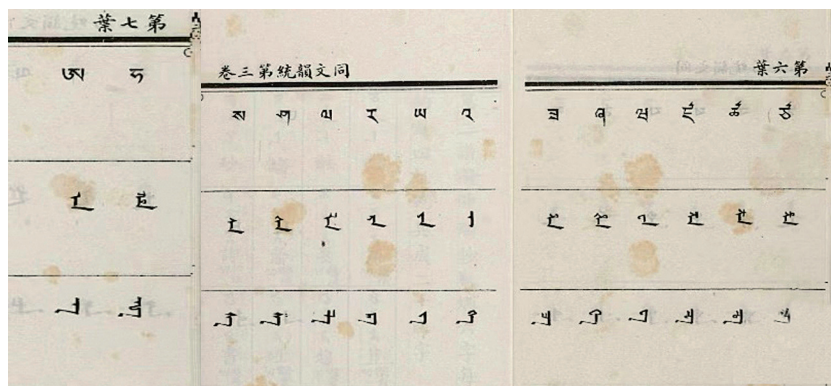


〔图三〕《同文》西番字母三十字与阿礼嘎礼字型



1

〔表三〕中前3个辅音与蒙古语相应辅音语音特征相近，其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同于蒙古文字母字形。回鹘式蒙古文阶段的蒙古文j辅音词中形式与c辅音字母形式一样，同为フ，但是蒙古文阿礼嘎礼体系中将其区分，分别为フj和フc字型〔图三：1〕，从



2

此蒙古文字母系统中j和c才有了各自的形式，并逐渐得以规范。后3个藏文辅音的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分别来自藏文ཁ、མ、འ的字形笔画，属于新创，如〔图三：2〕第三行右第五、六、七及其对应的藏文形式。

满文阿礼嘎礼前三个辅音字型是藏文顎辅音ca、cha、ja的读音[tea] [tea] [tea]形式，将ry书写在i和a的中间，即表示出这组辅音的顎化特征，又避免了两个不同元音的连写。ཁ/、sa、ཁ/sa则是参照相应蒙古文阿礼嘎礼字型与圈符号相结合而成的复合字型。藏文ha是小舌音字母，它还有标记长元音的功能，其满文阿礼嘎礼字型ハha是新创符号，如〔图三：2〕第二行右第七字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系统中将其独写形式ハ的词头符去掉后书写在a元音字型下面标记梵、藏语a元音，如ཨ ཨ ཨ ཨ。

〔表三〕是藏语独有而梵语没有的辅音及其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字型对应情况，这足以说明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除转写梵文系统外另有藏文系统。所谓的“阿礼嘎礼”不只单指转写符号体系，还包括其书写规则，尤其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在实际使用中曾转写有大量的藏传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等，它们体现了这两种阿礼嘎礼转写藏文时所遵循的规则。据此，本人认为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有梵、藏两种系统。

蒙古文阿礼嘎礼和满文阿礼嘎礼字型来源和结构特征比较明显，二者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二者的延续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文来自蒙古文，满文字母(包括特定字母)基本上可从蒙古文或蒙古文阿礼嘎礼找到原型。1632年奉清太宗皇太极之命对老满文进行改进时，加书了“点”和“圈”以区分不同语音，又从蒙古文阿礼嘎礼(1587年创制)借用和借鉴了部分字型 and 构字方式；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二

者的用途和使用对象方面。如前所述，这两套阿礼嘎礼都是为了蒙、满佛教典籍翻译中专门拼写那些梵、藏语专有名词、佛教用语和咒语而创制，因此其用途和对象是一致的。此外，两种阿礼嘎礼字型和结构又各自有其显著的特点，如蒙古文阿礼嘎礼创制使用了较多新创字型(共15个，包括元音e、o的标记方式)，而满文阿礼嘎礼新创字型只有7个(不包括满文特定字母)，这里没有包括 ē 和与圈点结合而来的字型。因此，在实际文献中满文阿礼嘎礼所记载的梵、藏语词和满语词在形式上多有混淆，而蒙古文佛教文献中的梵、藏语词则一目了然，易于辨认并复原其藏文形式。

蒙古文、满文佛教典籍中的大部分梵语来源词是通过藏文途径进入蒙古语和满语的。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对于“阿礼嘎礼”概念的说明，它既包括符号(字型)体系，也包括书写规则。蒙古文、满文阿礼嘎礼书写梵、藏语专有名词、佛教名词术语、人名地名、咒语时，遵循的原则就是对这些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藏文书面形式进行转写。《同文》卷三“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中藏文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和后加字及重后加字的说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书写原则不仅体现在五体合璧《大藏全咒》等御制、钦定的大型佛教文献，还贯穿于其他官方刊刻的单文种满、蒙古文佛教典籍和民间传抄本，可见清朝推行的“同文治之”政策对于我国各民族文字的发展和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附记：感谢评审专家对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指正。本文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春花、李文君等学者在资料搜集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一并感谢。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责任编辑：何 芳)